

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当代转型研究

张金荣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在传统时代, 鄂伦春族的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微弱, 它缺乏具体的认同载体, 表现为抽象的状态。但微观族群意识在鄂伦春族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影响下, 呈现出具象化特征。而当代鄂伦春族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强烈, 有了具体的认同载体, 由传统时代的抽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具象化。但在微观族群意识领域已退去了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 由传统时代的具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抽象化。

关键词: 鄂伦春族; 族群意识; 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80.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2010)01-0141-05

引 言

族群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族群共同体的意识, 它既相对独立存在, 又体现在对族群历史的了解程度、族群语言的使用、族群习俗的遵循、族群组织的依赖、族群信仰、族际交往等方面, 并受其影响。作为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世居族群, 鄂伦春人先祖早在商周时代就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之中, 清初更作为一支八旗劲旅转战黑龙江、新疆、西藏、台湾等祖国边陲, 在传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格局下, 形成了宏观上认同中华民族、微观上认同鄂伦春族共同体的族群意识。

随着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 留居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同胞从原始的氏族、部落状态一步跨入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那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转换, 当代鄂伦春族同胞的自身族群意识状况是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对此, 我们拟运用比较方法, 就与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相关的对族群历史的了解程度、族群语言的使用、族群习俗的遵循、族群组织的依赖、族群信仰、族际交往等方面, 进行传统与当代的对比, 以把握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变迁状况。

关于比较的具体内容, 对族群历史的了解程度拟选取族名、族源及本族历史传说作为指标, 族群语言的使用拟选取使用的语种、使用场合作为指标, 族群习俗的遵循拟选取婚俗、服饰为指标, 族群组织的依赖拟选取组织权威、组织功能为指标, 族群信仰拟选取宗教崇拜、社会理想为指标, 族际交往拟选取交往心态、交往矛盾作为指标。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 对于传统时代鄂伦春同胞的族群意识情况, 拟采取文献法, 借助建国初期关于鄂伦春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展开研究; 对于当代鄂伦春人族群意识情况, 拟采取问卷法, 对鄂伦春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在实地调查上, 我们以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的 70 名鄂伦春族群众为样本, 于 2007 年 7 月在对族群意识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60 份。^①

作者简介: 张金荣,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理论社会学、民族社会学。

① 本次调查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资助。

一、传统族群意识的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

新中国建国之初,鄂伦春族在知识传承上还主要表现为口述文化,父母和长者主要通过向年轻人讲述适于口述的历史传说故事,来传授生活经验和人生体会,“一些擅长讲故事的人在民间享有很高威望”^①。因而,族名、族源及本族群历史传说广为人知,人们都能说出本族群的来源,都熟悉本族群历史传说,崇尚猎人的鄂伦春族史诗《摩苏昆》也为当时的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其对中华民族族源的了解依靠的是外部的历史知识输入,这无法来自其族群自身,只能通过国家组织的学校教育。而建国初期鄂伦春族尽管经历过零星的学校教育,可毕竟入学者甚少,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但在总体上并不了解中华民族的族名、渊源及历史传说。

鄂伦春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也存在着一些外来语或从相邻民族语言借入的词,但一直以来都处于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状态。鄂伦春族群内部也因居住地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方言。在祈祷、祭祖等场合都使用较为难懂的神词、神语。即便在清代,也只有个别人熟悉作为官方语言的满语。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尽管由于日常贸易、政治管理的需要,部分鄂伦春人能够使用汉语,但只是在与外界交往时使用,日常使用的仍然是鄂伦春语。

在婚俗上,直至20世纪60年代,鄂伦春人仍然倾向于与本族通婚。1963年对鄂伦春聚居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乡新生村全村的统计表明,“鄂伦春族娶汉族姑娘为妻者有二人,娶满族姑娘为妻者一人,而鄂伦春族姑娘嫁给汉族的有四人”^②,异族通婚之少可见一斑。鄂伦春人的婚姻在传统上由父母决定,婚姻关系的确定在于仪式的举行和社会的承认,而与国家法律无关,即使是在建国之初,法律上的登记确认也基本流于形式。同时,在婚礼仪式上也与汉族及其他族群不同,留有部分娶新郎等母系氏族时代的遗风。在服饰上,由于长期以来的食兽肉、衣兽皮的狩猎文化及与外界相对隔绝,鄂伦春族同胞即便在建国之初享受国家布匹补贴的情况下,仍大量穿戴民族服装,尤其是猎人的服装更是以兽皮衣物为主;^③而作为那个时代国服的中山装、列宁服尽管在内地广为流行,甚至成为新时代新公民的象征,在鄂伦春人中间却较为罕见。

清代以来,鄂伦春地区实行以氏族组织——莫昆为基础的路佐制,并多是将莫昆达(氏族长)任命为佐领,尽管有国家因素的参与,但基本权威仍然是来自莫昆达的权威。莫昆达管理氏族内部事务,每年召开氏族大会,以接续族谱和解决氏族中的重大事宜。而莫昆的基本生产、生活单位是乌力楞(家庭公社),乌力楞由塔坦达(家族长)领导狩猎生产和处理家族内部事务。“1950年前,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小兴安岭地区,沿黑龙江和嫩江几十条支流分布着约150个鄂伦春人‘乌力楞’。”^④在新中国成立之际,鄂伦春地区仍然延续路佐制,鄂伦春人的基本活动单位仍然是乌力楞,仍然过着氏族公社生活,氏族组织也仍然发挥着现实功能。库玛干鄂伦春人的最后一位佐领孟守路,解放以后没有任何职务,但库玛干人有什么事情仍然请他决定,日常纠纷仍然请他调停,与其他氏族部落的重大交往活动仍然请他出面,甚至在他1965年去世之前仍然一直被库玛干人尊称为佐领。^⑤

从精神信仰上看,鄂伦春人的传统信仰既包括日月星辰及风雨等自然崇拜,熊、虎、狼等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也包括对在祖先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代表祖先神灵的巫师——萨满的崇拜。而萨满由于担当着通过祛邪、治病来为人们去除苦难的职能,更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信仰和支持。1900年

① 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4页。

② 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③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伦春族简史简志合编》,内部资料,1963年,第4页插图。

④ 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⑤ 唐戈:《鄂伦春族的“部落”组织——兼谈满族八旗制度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满语研究》2002年第2期。

至 1945 年, 仅逊克县新鄂村和新兴村地区, 就先后出现萨满 27 个。^① 相反, 由于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人员极少, 又通过氏族组织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 鄂伦春人对国家层面的思想信仰非常陌生。即便是建国之初在鄂伦春地区进行了免费并加补助的学校教育并加强了政府管理, 鄂伦春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仍然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 鄂伦春人在族群交往心态上有着很强的自我限制。尤其是由于此前在与满族、汉族等其他族群的不良商人的交往中常常处于不利状态, 甚至发生过族群层面的利益冲突, 鄂伦春人对其他兄弟族群经常心怀戒备。而这其中最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竭力挑拨鄂伦春族人们与汉族人们作为, 非常阴险狡猾地说: ‘不要怕汉人, 我们给你们做主’”^②。除非为了生活之必要, 鄂伦春人一般不主动与其他族群交往。但他们基本上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汉族等其他族群是自己的兄弟, 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大力地支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 对日本人等外国人有着天然的心理界限。

鄂伦春人的微观族群意识是其对于自己归属于鄂伦春族群共同体的意识。鄂伦春人不仅认同鄂伦春族群, 还熟悉鄂伦春的族名及族源, 使用鄂伦春语言, 遵循鄂伦春族习俗, 依赖鄂伦春族氏族组织, 信仰鄂伦春族的自身信仰, 且在族际交往时有着浓重的鄂伦春情结。这就表明, 鄂伦春族的微观族群意识并非仅是抽象的认同, 它还在鄂伦春族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的影响下, 呈现出具象化特征。宏观族群意识是鄂伦春人对于自己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尽管鄂伦春人认同中央政府权威, 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但他们不了解满语、汉语等官方语言, 不熟悉中华民族的族名及族源, 不遵循主流习俗, 不依赖来自国家的行政组织, 不具备国家层面的思想信仰, 在族际交往时也缺乏来自中华一体的心态和情感。这就表明, 鄂伦春族的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响微弱, 它缺乏具体的认同载体, 仍然表现为抽象的状态。从而, 传统时代鄂伦春族族群意识的基本特征跃然纸上, 即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

二、当代族群意识的微观抽象化与宏观具象化

较之传统时代的族群意识, 基于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的调查表明, 当代鄂伦春族的族群意识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国家已将鄂伦春族历史纳入了鄂伦春中小学的历史教育, 但对于鄂伦春族的渊源, 在被调查的 60 人中, 比较熟悉的 10 人, 约占 16%; 一般熟悉的 15 人, 占 25%; 不太了解的 35 人, 约占 59%。对于鄂伦春族的历史传说和族群象征物的熟悉程度, 比较熟悉的 11 人, 约占 18%; 一般的 15 人, 占 25%; 不太了解的 34 人, 约占 57%。对讲述鄂伦春族历史传说的感觉, 比较愿意的 9 人, 占 15%; 说不清楚的 14 人, 约占 23%; 不太愿意的 37 人, 约占 62%。而对于中华民族的渊源, 比较熟悉的 30 人, 占 50%; 一般熟悉的 17 人, 约占 28%; 不太了解的 13 人, 约占 22%。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说和民族象征物的熟悉程度, 比较熟悉的 20 人, 约占 33%; 一般熟悉的 28 人, 约占 47%; 不太了解 12 人, 占 20%。对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传说的感觉, 比较愿意的 25 人, 约占 41%; 说不清楚的 21 人, 约占 37%; 不太愿意的 14 人, 约占 23%。

在语言使用上, 尽管国家早已编写了鄂伦春语教材并纳入了鄂伦春中小学的课程体系, 但目前能够较好使用鄂伦春语的只有 11 人, 约占总量的 18%, 且年龄都为 55 岁以上; 另外 49 人基本上只能使用汉语, 约占总量的 82%, 年龄都为 54 岁以下; 而能够熟练使用汉语普通话的为全部样本 60 人, 占总量的 100%。能够较好使用鄂伦春语的 11 人中, 经常性使用鄂伦春语的只有 3 人, 约占总量的 28%; 一般性使用的 4 人, 约占总量的 36%; 几乎不用的 4 人, 约占总量的 36%; 在家庭内部交往

^① 秋浦:《鄂伦春社会的发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 171 页。

^②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伦春族简史简志合编》, 内部资料, 1963年, 第 14 页。

中使用鄂伦春语的1人,占总量的9%;老人之间使用的10人,占总量的91%;无人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在家庭内部交往使用鄂伦春语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日常工作中60人,占总量的100%;老年人之间60人,占总量的100%。

对于婚姻中择偶首要条件的6个选项——感情、才能、相貌、性格、家世背景、所属民族,将“感情”作为第一选择对象条件的45人,占总量的75%;将“才能”作为第一选择对象条件的15人,占总量的15%;相貌、性格、家世背景及所属民族无人选择。对于婚姻决定权,由当事人双方自己决定的28人,约占总量的46%;由自己和父母共同协商决定的32人,约占总量的54%;“由父母决定”这一选项无人选择。对于婚姻关系的确定标志,认同国家法律的登记确认的51人,占总量的85%;认同婚礼仪式和社会承认的9人,占总量的15%。在日常服饰方面,选择穿通行服装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无人选择穿民族服装。对于民族服装的穿戴场合,选择参加本民族节日庆典、进行交流活动时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无人选择在日常生活中穿戴民族服装。对于穿戴民族服装时的感受,比较自豪16人,约占26%;说不清楚的26人,约占44%;不太想穿的18人,占总量的30%。

在社会组织上,对于目前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鄂伦春族的族长权威这一问题,回答不存在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无人回答存在。对于目前是否还召开家族大会,回答不存在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无人回答存在。在目前生产活动的依托上,选择依托政府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无人选择依托鄂伦春族群。在目前日常事务的处理上,选择依靠鄂伦春族群的有13人,约占总量的21%;选择依靠政府的有39人,约占总量的79%。在目前家族内部事务的处理上,选择依靠鄂伦春族群的有16人,约占总量的27%;选择依靠政府的有44人,约占总量的73%。

对于目前是否有对自然物或动物的图腾信仰,回答是的3人,占总量的5%;回答否的57人,占总量的95%。对于目前是否经常举行家族性的祖先祭祀活动,回答不经常举行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无人回答经常举行。对于近期是否听到过有关萨满驱邪治病的事件,回答是的6人,占总量的10%;回答否的54人,占总量的90%。对于是否相信萨满驱邪治病,回答是的4人,约占总量的7%;回答否的56人,占总量的近93%。对于患病是首先去医院还是请萨满,回答去医院的60人,占总量的100%,无人回答请萨满。

对于是否愿意同其他族群交往,回答主动结交、加深理解的17人,约占总量的28%;回答一切顺其自然的43人,约占总量的72%;无人回答能避就避、尽量不交往。对于与其他族群交往时是否首先想到自己是鄂伦春人,首先想到的8人,约占总量的13%;想到但觉得无所谓18人,占总量的30%;根本没想到的34人,约占总量的47%。对于在同其他族群成员接触中是否经常发生矛盾,回答偶尔发生的43人,约占总量的71%;回答几乎没有发生的17人,约占总量的29%;无人回答经常发生。关于同其他族群成员之间的矛盾类型,选择工作冲突的29人,约占总量的48%;选择生活琐事的31人,占总量的52%;无人选择民族利益冲突。

综观这6个领域的具体调查情况,当代鄂伦春族的族群意识状况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都较传统族群意识有了截然的差别。在微观族群意识领域,鄂伦春人目前已经不再使用鄂伦春族语言,不再熟悉鄂伦春族的历史,不再遵循鄂伦春族习俗,不再依赖鄂伦春族氏族组织,不再尊崇鄂伦春族的传统信仰,且在族际交往时也不再具有鄂伦春情结。这就表明,鄂伦春人的微观族群意识现已退去了自身特有的族群元素,由传统时代的具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抽象化。在宏观族群意识领域,鄂伦春人不仅认同中央政府权威,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还运用汉语普通话等官方语言,大多熟悉中华民族的历史,遵循中华民族的主流习俗,依赖来自国家的行政组织,基本具备国家层面的思想信仰,在族际交往时也拥有来自中华一体的心态和情感。这就表明,鄂伦春人的宏观族群意识受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元素的强烈影响,有了具体的认同载体,而由传统时代的抽象化转向了截然不同的具象化。这也就是说,较之传统时代的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鄂伦春人族群意识呈现出了微观抽象化与宏观

具象化的转型。

结 语

1949年以来,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理念下,我国不仅在经济上对各少数民族同胞予以扶持,更一直实行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习俗、宗教等政策,致力于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保护和发展。然而,在现代化的浪潮下,整个中华民族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都发生了由分立到一体的渐变。现代化进程推广了汉语普通话,普及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知识,生成并拓展了新的习俗风尚,组织了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建构了社会主义思想信仰,更将国内的所有族群都纳入一体化的交往之中,并且这种国家层面的新生文化随着现代化脚步的推进而影响日深。

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与一体化,不可避免地让鄂伦春族传统文化淡出了日常生活。鄂伦春语言不再为鄂伦春人使用,鄂伦春族群历史不再为鄂伦春人熟悉,鄂伦春氏族组织不再为鄂伦春人依赖,鄂伦春日常习俗和传统信仰不再为鄂伦春人所拘泥,鄂伦春情结也不再为族际交往所囿。与此相伴的是鄂伦春文化传统,在民族政策保护下走向了象征化与博物馆化。相反,鄂伦春人的社会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由边缘归入主流。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汉语普通话,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遵循新的习俗风尚,依赖国家行政系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不分族群的交往。

因此,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转型是现代化浪潮下我国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边缘归入主流的普遍趋势的必然结果。传统时代族群意识的微观具象化与宏观抽象化的基础,在于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较完整存在并发挥功能。鄂伦春语言的普遍使用,鄂伦春族群历史的耳熟能详,鄂伦春习俗的日常运用,鄂伦春氏族组织的存在,鄂伦春族传统信仰的延续,族际交往时的鄂伦春情结,都使微观的对鄂伦春群体的认同有了具体的内容和载体,并置宏观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于抽象状态。而当代鄂伦春人族群意识的微观抽象化与宏观具象化转型,正是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鄂伦春人从原始的氏族社会融入了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致使鄂伦春人一方面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日益萎缩、功能日益丧失,一方面在国家层面的族群交往中形成的新文化方面内容日益丰富、功能日益实用。既把微观的对鄂伦春群体的认同虚化为抽象状态,又让宏观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拥有了具体内容和载体而呈现具象化。

责任编辑:尚永琪